

创

桥

学

派

概

念

史

译

丛

主编 李宏图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梅尔文·里克特◎著 张智◎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梅尔文·里克特◎著 张智◎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英)梅尔文·里克特著;张智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

ISBN 978-7-5617-6733-7

I. 政… II. ①梅…②张… III. 思想史—欧洲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1126号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

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著者 梅尔文·里克特[英]

译者 张智

策划编辑 周洁

审读编辑 陆海明

责任校对 邱红隼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6开

印张 17.5

字数 224千字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

印数 3100

书号 ISBN 978-7-5617-6733-7/G·4077

定价 38.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中文版前言

李宏图

2005 年《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出版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剑桥学派”的关注,这说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为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引介“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思考与准备后,我决定选择将“概念史”作为主题,组织同行选译与此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因为“概念史”不仅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而且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较少关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现在“剑桥学派概念史”这套译丛终于得已面世。

斯金纳在他思想史研究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这样说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变化的事实,而且还要将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

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会被新的概念所取代。

目前,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斯金纳自己也一直说,我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他通过对一系列概念历史的研究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1978年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他研究了“国家”这一概念,着重考察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也就是说,这一定义的“国家”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要以“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同样,沿着这一思路,在199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他又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考察。在研究中,他并没有简单地重新恢复这些概念的含义和意义,而是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其主导性地位。值得重视的是,斯金纳不仅展开了对有关“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对支撑概念合法性基础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因为思想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表达本身,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来为某种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解构某种合法性。

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由于受到德国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其概念史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由于一个社会改变了其基本价值或者实践方式的时候,同时也就改变它的规范性词语。因此,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即概念的兴

起和衰亡。

对于概念史的两研究路径,斯金纳评论道: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最终也会消失。我承认,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

从概念史研究的空间来说,目前不再仅仅局限在这两大流派的诞生地英国和德国,法国、荷兰、芬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对概念史的研究也十分踊跃,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已进入到了概念史研究领域,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

目前,国内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介绍。从与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其它国家,即使与我们相临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由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翻译这一套丛书,借以推进国内概念史研究的发展。

在这套丛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作为这套丛书的主持者,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译者,他们都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为了做好此次翻译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推掉了其它的写作任务,一心扑在了翻译工作上。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多朋友,特别是责任编辑周洁女士,通过他们的努力,从版权的洽谈到图书的编辑,各个环节都做到了高效和顺利,从而保证了这套丛书的如期出版。

在这套“概念史”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学界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寿福教授、张巍博士和夏洞奇博士等,他们帮助处理了诸多语言上的问题,在此表示谢意。

2008年,当这套丛书还在翻译中的时候,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我也应一家杂志之约对国内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了回顾。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这样写道: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在这一

变化中各个国家都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的时候,中国学者才刚刚开始接受和引进他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仍然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变化的学术发展进程中,更不要说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且有原创性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或者说研究范式。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暴自弃,相反,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更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

也许本套译丛能够体现我们的这一主旨,并印证着我们一直耕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那种执着和努力。

2009 年 11 月

致 谢

几年前,我很有幸在德国沃尔芬的赫尔佐克—奥古斯特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一种德国史学类型:“**Begriffsgeschichte**”,即概念的历史,或概念史。此种探究模式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此,我开始着手研究它的各种形式。首先,我试着理解造就概念史研究方案的一般理论,对在这些方案中所应用的资料进行甄别,并试着对概念史的成果进行评价。这些技巧方法也同样运用于思想史研究中。当然,我对它们很熟悉,就如同我熟悉在我自己的专业:政治思想史中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一样。不过,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概念史确有许多内容可以提供给使用英语的学者。概念史学家们系统地探究了与他们最为接近的英语世界的同行所未能甄别的资料来源,并发展出以全新有用的研究框架来阐述重大的问题。

我力图在本书中传达我自己所了解的概念史,在我的英语世界的同行面前为概念史辩护,并在他们与德国概念史学家之间开启一次对话。我既受益于英语世界的同行甚多,亦受益于德国概念史学家甚多。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的诸位师长——佩里·米勒(Perry Miller)、

F·O·马西森(F. O. Matthiessen)、C·L·巴伯(C. L. Barber)、C·H·麦基尔韦恩(C. H. McIlwain)、塞缪尔·比尔(Samuel H. Beer),以及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成就了我;政治思想研究会的同事以及《政治理论》杂志编辑部的同事的评论使我长期受益匪浅。

J·G·A·波考克与昆廷·斯金纳——这两位老友对政治思想史与语言所做出的贡献令我钦佩异常——不辞劳苦地写来洋洋洒洒又下笔谨慎的信,讨论我所撰写的关于(在第六章中)他们的著作与德国概念史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彼得·拉斯莱特慷慨地提供了有关剑桥大学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信息。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礼貌与坦率。

研究政治和社会概念史如何在战后的德国演变,已经成为一项颇有收获的体验。在面对概念史的实践者时,我暴露出自身训练与所需知识之间存在的许多差距。在此,我想承认我亏欠朋友们和同事们很多,他们曾尽力提供给我所欠缺的但又需要了解的知识。我尤其想感谢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与罗尔夫·赖夏特(Rolf Reichardt)。我同样极大地受益于霍斯特·德赖特茨尔教授(Horst Dreitzel)、卡尔弗雷德·格伦德尔教授(Karlfried Gründer)、汉斯-乌尔里希·贡布雷希特教授(Hans-Ulrich Gumbrecht)、威廉·亨尼斯教授(Wilhelm Hennis)、吕西安·霍尔舍教授(Lucian Hölscher)、于尔根·科卡教授(Jürgen Kocka)、克里斯蒂安·迈尔教授(Christian Meier)、已故的托马斯·尼帕德教授(Thomas Nipperdey)、曼弗雷德·里德教授(Manfred Riedel)、沃尔夫冈·席德尔教授(Wolfgang Schieder)、鲁道夫·菲尔豪斯教授(Rudolf Vierhaus),以及汉斯-埃里希·伯德克博士(Hans-Erich Bödeker)、霍斯特·贡特尔博士(Horst Günther)、基思·特赖布博士(Keith Tribe)和格尔德·范登霍伊费尔博士(Gerd van den Heuvel)。赖因哈特·科泽勒克阅读并修改了本书的第二、三章,罗尔夫·理查德认真审阅了第四、五章,对此我尤表感谢。至于本书仍存在的错误则由我自己来承担责任。

我非常愉快地承认,在写作中,我从我的妻子,米夏埃拉·文宁格·里克特(Michaela Wenninger Richter)那里得到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她以编辑和批评家的经

验,以及她的建设性反思和在概念史问题上的深入探索,对我所写的内容帮助很大。我的两个儿子,安东尼(Anthony)和贾尔斯(Giles)则以我无以言表的方式始终支持着我。

我还要感谢一些机构,有了它们的协助,才使我的关于概念史的研究、访谈和著作能和大家见面,它们包括:纽约城市大学 PSC-CUNY 研究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埃尔哈特基金会。沃尔芬赫尔佐克-奥古斯特图书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及慕尼黑大学富布莱特教授席位支持了我对于“专制”概念史的相关研究。本书的第一稿完成于 1987 至 1988 年间,其间我在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工作,然后作为访问学者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观念史研究小组从事研究工作。我作为美国安德鲁·麦伦研究奖金获得者,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三角研究园的国家人文学科中心以及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手稿最终修改完毕。

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与哲学研讨班的参加者在他们提交的论文中所做的评论,感谢政治思想研究会所举办的关于启蒙运动的国际会议,感谢芬兰政治科学协会语言和政治研究组、墨尔本的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研讨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观念史研究小组研讨班、法国历史研究三人小组、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研讨班,以及两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荷兰高级研究院召开的概念史会议,另一次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召开的关于文化史的会议。在这里我想对汉斯·阿尔斯勒夫(Hans Aarsleff)、基思·迈克尔·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托马斯·齐尔德斯(Thomas Childers)、理查德·弗拉特曼(Richard Flathman)、已故的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克努特·哈康森(Knut Haakonssen)、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已故的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弗兰克·柯克兰(Frank Kirkland)、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威廉·麦克清(Willem Melching)、卡里·帕洛宁(Kari Palonen)、冈瑟·罗特(Guenther Roth)、大卫·桑福德(David Sanford)、杰罗尔德·西格尔(Jerrold Siegel)、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戴尔·范克利(Dale Van Kley)、威齐尔·韦莱玛(Wyger Velema)、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等

人对本项目的帮助表示感谢。

在研究的过程中,图书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也同样感谢以下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它们是:沃尔芬赫尔佐克-奥古斯特图书馆、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舒和兄妹学院图书馆、观念史研究小组图书馆、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亨特学院图书馆及研究院的图书馆、纽约城市大学图书馆、人文学科中心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以下期刊中发表:《概念史与政治理论》,载《政治理论》1986年总第14期,第604—637页;《概念史与观念史》,载《观念史杂志》1987年总第48期,第247—263页(芬兰语译文见,《政治》1989年总第31期,第76—87页,卡里·伯罗那写了导言);《波考克,斯金纳与〈历史的基本概念〉》,载《历史与理论》1990年总第19期,第38—70页(德语版题为:《论政治语言史的重构:波考克,斯金纳与〈基本历史观念〉》,载《旧欧洲抑或现代早期?问题与研究方法》,汉斯-埃里希·伯德克,恩斯特·欣里希斯编[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0],第134—174页);《理论与实践中的观念史:重构政治观念与语言的历史》载于威廉·梅尔金,威杰·威勒玛编《文化史主要趋势》,(阿姆斯特丹,1994年版);《当代经典鉴赏:〈历史的基本概念〉与未来学术》,载华盛顿特区的德国历史协会不定期刊物《概念史》(纽约,1995年版)。

导 言

本书旨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简要评介概念的历史或“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这是一门自上世纪^①中期在联邦德国兴起的史学类型。它的理论目标、研究计划和实际表现,都与以英语进行工作的学者所著的观念史、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将按照以下模式引用三本主要著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语言与社会语言的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r Sprache in Deutschland*),下简称为《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性的哲学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下简称为《哲学辞典》;《法国基本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手册,1680—1820》(*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um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下简称为《手册》。^②1971年,《哲学辞典》的第1卷面世;随后,

① 指20世纪——译注。

② 《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语言与社会语言的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r Sprache in Deutschland*),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维纳·孔茨(Werner Conze)、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编,迄今已出7卷(Stuttgart, 1972)。《历史性的哲(转下页)

《历史的基本概念》的第1卷于1972年出版;《手册》则一直到1985年才得以出版。

第一次碰到“概念史”的人可能会提出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如:作为一种史学类型,它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概念史之于黑格尔的方法是延续还是断裂?使用英语的读者倾向于将黑格尔的方法与任何强调概念的德国理论联系起来。现今的概念史与狄尔泰及其信徒的“精神史”(一套根据共有的假定、预想或时代精神书写划时代的历史或文化史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德国的概念史又如何与美国的A·O·洛夫乔伊(A. O. Lovejoy)及其学派所实践的观念史区分开来?最后,又如何将概念史与英语世界中最接近于它的类型,那种由J·G·A·波考克(J. G. A. Pocock)、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邓恩(John Dunn)、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詹姆士·塔利(James Tully)、安东尼·帕格登(Anthony Pagden),以及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所从事的,强调对政治词汇、语言、意识形态或话语进行“严格历史性的”研究的工作相比较?^③

在此,我先简要地回答以上疑问。第一章将更为详尽地解答这些问题;第二章中,将讨论《历史的基本概念》这一辞典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案,该章展现的是由《历史的基本概念》的编辑们发展出的,概念的社会史与结构社会史的结合;第三章将对

(接上页)学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卡尔弗雷德·格伦德尔(Karlfried Gründer)编,迄今已出8卷(Basel and Stuttgart, 1971)。《法国基本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手册,1680—1820》(*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罗尔夫·赖夏特(Rolf Reichardt)、埃伯哈德·施密特(Eberhard Schmitt)编,格尔德·范登霍伊费尔(Gerd van den Heuvel)、阿内特·霍弗(Anette Höfer)参与合作,迄今已出8卷(Munich, 1985)。之后,赖夏特和汉斯-于尔根·吕泽布林克(Hans-Jürgen Lüsebrink)接任编辑。赖夏特放弃了“辞典”这一术语,他更愿意在书名中使用“手册”一词。因为较之《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哲学辞典》这样包含了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概念用法的辞典,该辞典的年代跨度相对较短。《历史的基本概念》由克勒特-科塔出版社出版,《哲学辞典》由施瓦贝公司出版社出版,《手册》则由R·奥尔登堡·费尔拉格出版社出版。

③ “严格历史性的”是昆廷·斯金纳的惯用语。参见其《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2卷本(Cambridge, 1978),第1卷,第xi页。关于上述作者著作的参考书目参见《现代早期欧洲政治理论的语言》(*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安东尼·帕格登主编(Cambridge, 1987)。

《历史的基本概念》中一篇关于“Herrschaft”(支配、权威、领导、统治、命令)概念的长文进行一次详尽的归纳与分析[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在划分正当性“Herrschaft”的三种类型时,使用了这一概念;通过韦伯的使用,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许对这一概念最为耳熟能详]。

我的讨论旨在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说我们了解了一个概念的历史,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什么?第二,对于那一概念的历史的了解,概念史带来了哪些不同之处?

《手册》的方案则是将“概念史”的资料来源和那些探究旧制度、大革命、复辟王朝期间法国心态的社会史(第四章将对其进行讨论)的资料来源结合起来。但是,和那种与《历史的基本概念》的编辑,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维纳·孔茨(Werner Conze)相联的结构社会史(在第二章中,我将对其进行讨论)不同,《手册》的模式是由诸如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这样的第二代年鉴历史学家发展起来的。在仔细地对手册中的文章进行归纳的基础上,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对《手册》的方案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程度、对它在有关法国政治词汇是如何发展的知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进行评价。第六章试图将《历史的基本概念》和《手册》与波考克、斯金纳以及其他置于同一背景之中,从而使读者可以比较、评价德国和英语世界研究语言的途径。我的结论则是为英语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进行辩护。

回到开启了这一部分的疑问:概念史属于哪种类型?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将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三类实践来对它进行讨论;这三类实践,是由相应的三项百科全书式的项目发展起来的。尽管单个作者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近来德国大部分关于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的工作正是在这三类著作中展现了出来。我将尤为关注《历史的基本概念》与《手册》,这两部著作论述了在德语欧洲和法语欧洲,关于政治、政府、社会的概念性词汇和独特的语言所发生的主要历史性转变。第三部著作《哲学辞典》,内容非常广泛。但只有当政治和社会概念处于广义上的哲学领域时,它才对这些概念进行讨论。虽然它梳理了概念的转变,但是,它很少如《历史的基本概念》与《手册》所做的那样,将这些概念的转变与它们的政治语境和

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我将“概念史”作为一种通称,意指所有这三种研究概念历史的学术实践。因此,正是思想史中这种将概念作为分析单位的选择,使得“概念史”与别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那些研究方法聚焦于其他主题,如:单个作者、文本、流派、传统、持久不变的问题、争论的形式、思想的风格、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等。《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哲学辞典》的第1卷出版后的25年间,无论是在参考书中还是在个人文集中,德国的概念史学家都显著地促进了我们对于历史之中,以及政治、社会和哲学语言之中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的了解。“概念史”的实践者已经创造出新的技艺,同时采用已有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哲学研究方法,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就我看来,在今天,他们的工作为对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专业词汇以及哲学的专业词汇的严格历史研究设立了标准。正如一位英国评论者所写的那样:“未来的研究者们只有在自冒风险,当然,同时也准备付出代价的时候,才会忽视这些论文。”^①

不过,大部分关于“概念史”的工作超出了撰写词语或术语的历史。实际上,《历史的基本概念》的主要理论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就坚持:对于一个概念的考察决不能局限于判定词语的涵义或它们在涵义上的转变。^② 概念史学家的中心关注则要理论性得多和雄心勃勃得多。这些关注与下述信念无关,这种信念认为,一个词汇最初的或现代科学产生之前的涵义,才是它真实的,或者说是自然的涵义。不知如何确定并永久地界定词语的涵义,这一与语源学相伴的困扰,已经为概念史学家放弃,如同那些现代语言学家已经放弃了它一样。语源学在“概念史”中鲜有作用,或者毫无作用。

然而,在英语学术界,对这一史学类型著作中的研究方案及成果仍所知甚少。这就意味着,要为那些关注政治和社会思想史、关注语言、关注思想史和观念史的人,提供对这类作品的说明。本书还会关注社会文化史家所关心的“心态史”、“政治

① 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评〈历史的基本概念〉》,《社会史》(*Social History*), 1979年总第4期,第371页。

②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概念史”与社会史》(“*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收于《过去的未来》(*Futures Past*),基思·特赖布英译(Cambridge, Mass., 1985),第420页。

文化”或被称为思想的社会史的内容;关注知识社会学的实践;关注政治和社会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非常关心仍然作为其学科中心的概念最初的和过去的使用。对于一般的哲学史学家而言,对于专门的伦理哲学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史学家而言,以及对于法律史学家、语言史学家、修辞史学家而言,他们都将在“概念史”中找到与各自研究领域有着重大关联的一批作品。^①

最后,我希望我的著作能促进英语世界研究政治和社会“话语”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与德国的概念史学家之间的对话。无疑,对于因语言划分而成的双方而言,必须学习的东西都还很多。尽管我主要限于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然而,我也将简要谈及英语世界中所做的工作。如同将在第六章中讨论的那样,我强烈地感觉到,过去30年间,在政治语言的哲学和历史方面,英语世界类似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迄今为止所实践的“概念史”相协调一致的;而且,这些成就的确提供了应对其不足之处的方法。另一方面,英语学者只可能从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成就中获益。因为就其实践而言,即使是英语世界中,那些在方法论上最反对概念史研究的政治语言史学家也无法回避,且不会回避对他们所论及的词汇中的核心概念在涵义上和使用上所发生的转变进行综合。

从一开头,我就提醒读者,不要将概念史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或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任何形式等同起来,不要假定这里所讨论的隐藏在这一新名称之下的思想实践,只不过是著名的德国方法和流派。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已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狄尔泰和梅尼克的历史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批评。实际上,本

^① 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爵士将“词源学之谬误”描述为:有一种假设认为,根据那样的事实,词语的最初涵义和形式必然是该词语正确的涵义和形式。那么,我们遇到下述论点的机会会有多频繁,这一论点是:因为某个词源于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所以词语的正确涵义必须是其最初的涵义?这一论点是谬误的,因为该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默许假定,即认为形式与涵义之间存在着最初的、且真实或适当的对应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假定是无法得以证实的。“我们无法追踪一种词汇中大部分词语的源头……所有的语源学家都告诉我们,证据显示,所谓的最初的形式和涵义只是该词语一个较早时期的形式和涵义而已。”[《语言与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ambridge, 1981), 第55页]亦见约斯特·特里尔(Jost Trier):“语源学”(Etymologie)条目,《哲学辞典》,第2卷,第816—818页。

书中所强调的“概念史”的形式,正是作为对上述德国学派明确的反对而出现的。新的概念史学家抨击他们的前辈将诸如精神(Geist)和观念(Idee)这样的一些思想观念具体化了。如狄尔泰、梅尼克和罗萨克这样的早期史学家,因其将思想和概念与它们所处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相分离,与它们在特定的政治辩论中具有武器的用途相分离,从而遭到责难。这些历史学家将理论和理论家视为完全自主和无立场的;概念史的创立者则反对他们,并断言有必要将社会史和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和内容,同他们的研究结合起来。

无论是“概念史”所提出的问题,还是从中发展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都将在下文中得到详细的考察。我将论证:“概念史”提出了被许多英语世界的读者视为“语言转向”的主题,并对其涵义进行了研究。与如今所提供的任何其他选择相比,概念史和迄今为止那些研究政治和社会思想及实践的历史学家所做的最为出色的工作更为协调一致。^①我希望证明:“概念史”将在英语世界研究政治语言和社会语言的学者可使用的研究方案中,增添许多复杂的理论方案和研究方案。

自始至终,我的兴趣不在于考察这些讨论中可能作为中心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问题,而更多是对目前概念史领域中数量空前的研究成果及其不研究状况进行评价。^②在一个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于过去的语言、话语和涵义体系的关注持续增加的时刻,对“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就显得尤为迫切。这种持续增加的对于语言的关注,源于对以前方法的不满,对诸如那些被认同为属于A·O·洛夫乔伊的,在思想史和观念史以及政治和社会思想史中所使用的

① 参见拙文《理论与实践中的概念史:重构政治概念史与语言》(*Begriffsgeschich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Concepts and Language*)中的讨论,收录于《文化史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威廉·梅尔金(Willem Melching)、威齐尔·韦莱玛(Wyger Velema)编(Amsterdam, 1994)。

② 鉴于德语和英语国家的观念史学家、政治和社会语言学家们对彼此的成果所知甚少,本书会包含比作者所期望的更多的说明成分。然而,任何其他策略又都会使得那些作为本书谈话目标的读者更难理解这里所论及的内容。